

30年代经济危机与德美资本主义

吴友法

1929年开始爆发的30年代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以德国为首(还有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的封建势力影响比较强大、资产阶级民主比较脆弱的国家;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还有英国、法国等)的封建势力影响较小、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完备的国家。剖析德美两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对于认识30年代经济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德国经济和美国有着特别的关系,一战后德国经济的发展是靠美国资本扶植起来的。“德国不仅大量吸收了美国资本,还拼命引进美国工业的科学管理和提高效率的方法”^①。早在1928年,施特雷泽曼就指出:“我们是靠借贷过日子。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②因此,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迅速波及到德国。美国 and 德国受这次危机的打击最严重。

危机使两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9年工业生产指数每月平均为100,1932年7月危机最低点时整个世界工业生产为57.2,德国为52.4,美国为49.2,英国为78.1,法国为65.9,瑞典为67.9^③。德国和美国工业生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德国工业生产倒退36年,美国倒退2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倒退25年)。农业危机也特别严重,农产品堆积如山,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德国由1929年的102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65亿马克,美国由1929年的85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40亿美元。两国的银行信贷系统陷于瘫痪状态。1931年7月,德国所有银行交易所全部关闭^④;至1933年,美国银行倒闭了11730家,继英国之后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整个国际贸易在1929年至1933年象螺旋线一样逐渐紧缩(enger werdende Spirale),1929年为299800万美元,1933年下降为99200万美元^⑤。美国和德国最为严重。美国进口总值缩减了70%,德国减少了70.8%;1929年至1935年德国出口总额减少了69.1%,美国资本输出几乎完全停止。如德国在1932年一季度每月出口利润为12100万马克,三季度每月只有8100万马克;美国一季度每月为4370万美元,三季度仅为70万美元^⑥。

经济危机使德美两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德国中小企业破产达几十万家,全部开工率只有1/3,在欧洲名列前茅;美国有13万家以上企业破产。资本主义国家总失业人数为3000万,其中美国高达1300多万,德国达到800万。这些失业的流民“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⑦。美国胡佛政府对广大失业工人持敌对态度,不予救济,认为“救济就是帮助懒惰”^⑧。这些失业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垃圾堆里寻找充饥的食物。整个美国“变成了饥饿、疾病、困乏和人民日益陷于赤贫的魔穴”^⑨。德国人民陷入“困苦深渊,有的家庭仅仅以土豆维持生活,人们的脸上几乎是绝望的情绪”^⑩。德国的柏林每天因饥饿而自杀的有60多人。

经济危机还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其标志之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德国在1930年发生了312次罢工,1932年下半年,仅两个半月时间就发生了900次罢工。美国在1929年至1932年共发生了2700次罢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严重动摇了两国的资本主义统治。

政治危机的另一标志是资产阶级内部现存统治方式发生了危机。

在德国,危机使法西斯势力不断增长,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危机,专制主义倾向重新抬头。经济危机之前,法西斯影响不太大,1928年底纳粹党只有10万人,在议会选举中只获全部选票的2.6%,仅占13个席位,德国议会民主制的机器还是照常运转。可是,经济危机为纳粹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埃尔德曼指

出：“希特勒在群众性失业期间懂得巧妙地利用宣传方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产生于经济危机形势，与对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的愤慨以及对‘体制’的不满有关”^⑪。纳粹党充分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困境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大肆进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德国人民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在对魏玛共和国感到失望的情况下，纷纷聚集在纳粹党的旗帜下。1932年纳粹党超过了100万，在这年7月31日选举中赢得1370万张选票，议会中获230个席位，占议会总席位37.8%^⑫，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法西斯的目标是要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专制主义统治。法西斯在选举中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魏玛议会民主制的统治方式。因为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在议会中有89席。纳粹党在选举胜利后，与共产党一起占议会总席位的52.5%（议会共有608席）^⑬。两个党的“联合行动能够废除”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⑭，常常使议会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在法西斯的进攻面前，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没有坚持道义的勇气”^⑮。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克服危机，逐渐地抛弃了议会民主制，依照宪法第48条开始确立总统制内阁，即“宪法规定的专制”统治^⑯。用总统制内阁代替正常的议会民主制，即用总统颁布的“紧急条例”维持统治。危机期间，德国选举频繁，多政党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一样更迭，在短短几年更换了四次，无法按现存统治方式维护统治。

经济危机使美国也滋生了法西斯主义。1932年，在美国中西部成立了秘密法西斯组织“黑色军团”，专门从事暗杀、绑架活动；在亚特兰大成立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1933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成立了“银行社”，该组织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与纳粹党关系密切。另外，成立于1919年的以退伍军人为骨干的右翼团体“美国军团”以及老牌组织“三K党”，在危机中也恢复了活动。这些法西斯组织在美国也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它们企图把“群众的失望心理和不满情绪，引上反动的法西斯的轨道。”^⑰美国法西斯的兴起对美国民主制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美国的传统自由民主制度，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也充分暴露了其弱点，即导致一切领域的极端放任主义。美国总统胡佛在危机中固守不变地因袭传统的统治方式，完全撒手不管，任其放任自流。对此，下层人民群众、中小企业界人士也十分不满。一些资本家为解救危机，也要求政府改变统治方式。在大危机面前，完全丧失国家职能的自由民主制的统治方式也不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除统治方式发生危机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在两国发生了危机。

虽然在一战后，由于“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⑱，但直到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前，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继续奉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采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主义，反对一切妨碍自由竞争的政策和措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是一架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器”，国家干预只会破坏经济生活中的自然规律。以往爆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来解除的。放任主义在自由竞争时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作用，人们把自由放任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指路明灯。但在这次危机中，自由放任的经济自动均衡论不灵了，不能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医治经济危机的良方。德美两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意识到这一点，也被迫采取了一些反危机措施。

德国以维护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的企业和部门为理由，对大企业、大银行提供贷款和保证金，而对中小企业不闻不问，任凭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吞并。局部反危机措施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痛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由于德国人民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受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相反，希望出现旧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对他们予以保护^⑲。经济危机使“德国人所需要的不单纯是革命，而且也要复辟”^⑳。法西斯注意到了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人民群众希望社会安定的思想状况，所以也大肆宣传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大肆宣扬“强权国家是改善经济状况的前提”^㉑。

美国总统胡佛在危机发生后，严格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确信市场调节可以使美国平安渡过危机，因而对危机持乐观的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任凭大生产吞并小生产。显然，这种政策对30年代大危机是不灵了。在美国舆论强烈要求下，胡佛在农业、财政金融等局部方面采取了一些反危机措施，如部分收购农产品，发放信任贷款，成立复兴金融公司等。但是，这些措施同德国一样，“太偏向上层阶级”^㉒，只是有利于大资本家，其核心是坚持推行自愿联合和赞助的政策，即仍然以放任主义为前提。“负债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和破产的企业界人士，要求联邦采取比总统乐于赞助的更为勇敢的行动”，“各种各样不满力量，抛弃了总统”^㉓。胡佛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传统的经济政策，无法缓解危机，又“失去大多数美国人民的信任”^㉔，他悲哀地宣称：“现在已经是日暮途穷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㉕。

总之，这次经济危机使德美两国危机四伏。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查尔斯·施瓦布指出：

“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②6}

二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②7}。30年代经济危机使两国垄断资产阶级无法维持现存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种可能性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改良，变换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30年代经济危机虽然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在以德国和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出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势。因此，第一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德美两国是沿着第二种可能性这条道路去寻求摆脱危机的“良方”。

前已述及，德美两国在危机期间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的调节措施，这些措施仍是以放任主义为前提，无济于事，无法摆脱困境，不得不调换人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新的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片凄风苦雨之中，1933年初出现了两起世界瞩目的事件：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扶持下上台执政；3月4日，罗斯福在美国竞选中获胜，出任总统。他们各自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效犬马之劳。然而，两国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不同的统治方式，走上了既相同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

德国法西斯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类型，是在德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是德国历史上的倒退。希特勒为了建立法西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有意识地大量收集关于“政党政治体制腐败”的材料^{②8}，进行鼓吹宣传，彻底抛弃了议会民主制，取缔了共产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使纳粹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党和国家政权合一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统治原则”^{②9}。纳粹政府通过“授权法”，剥夺了魏玛宪法中人民在政治上的基本权利^{③0}，德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自由，“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政体让位于一党制国家”^{③1}。希特勒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束。德国“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③2}

罗斯福是美国民主党人士，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主张在保存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前提下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他曾说：“为了永远纠正我们经济制度中的严重缺点，我们依靠的是旧民主程序的新应用”^{③3}。他虽然继承了美国传统的民主制度，但也有一些改变，明显地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加强了国家的职能。他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了民主、共和两党的联合内阁，在总统领导下共同执政。他上台后，要求国会授予他“紧急全权”。他说：“我要求国会授予我唯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付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③4}他没有经过国会，组织了“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他还经常使用否决权，夺取立法权，降低国会的威信。这些都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推行“新政”的需要，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民主制度，然而又和美国历届政府在统治方式上是有不同的。

从实行经济政策来看，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是实行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加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把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控制方式在两国是有所不同的，德国主要侧重于从组织上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管理，而美国侧重于通过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对经济生活进行指导。

希特勒为了从组织上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1933年成立了帝国经济部，作为中央最高调节机关。在帝国经济部下设立各种专业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和农业、市场、物价、对外贸易等部门。帝国经济部有权规定建立新的卡特尔，有权限令没有参加卡特尔的企业进行合并，1936年德国卡特尔多达2500个。另外，德国还设立了一个“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其职责是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以及对各个企业的原料、资金和产品进行分配和严格的管制。通过这些组织的控制，德国国有企业大为增加。1933年公共经济占全部投资49%，1938年占57%^{③5}。国有股份资本由1929年的29亿马克，增加到1939年的36亿马克，加上国家掌握的铁路、邮政部门，国有垄断资本总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20%以上，约有248亿马克。

罗斯福上台后，“一反美国的经济传统，大力开展国家经济活动”^{③6}，在美国实行“新政”。“新政”的指导思想是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相吻合的。罗斯福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主要是通过“新政”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实现的。他上台后制订了70个以上的第一批“新政法令”，在金融、工业、农业、贸易和财政各个方面推行“新政”。面对执政时金融系统“有47个州银行或者关闭，或者在严格限制下进行营业”^{③7}

的混乱局面，他首先颁布了“紧急银行法”、“黄金储备法”、“存款保险法”，整顿了货币流通领域。随后颁布的“农业经济调整法”，为解决农产品大量“过剩”，规定国家用补贴的办法限制农业生产，对缩减耕地面积，减少产量的农场主和广大农民，国家予以奖励和津贴，同时拨出大笔款项，收购农畜产品，人为地加以销毁，从而稳定了农业生产，农业净收入从1932年的19.28亿美元增加到1935年的46.05亿美元^{③④}。“产业复兴法”规定国家对面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提供贷款，扶持这些企业免于破产，并规定各部门生产的规模、市场分配、价格水平、工资水平等，鼓励企业制定公平的竞争法规，从而刺激了工业生产。

希特勒的目的是企图“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③⑤}。德国干预经济主要是致力于发展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和美国是不同的。德国国家经济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把劳动力、资金、原料和设备等优先供应给与军需生产有关的部门，加强军工生产。从1933年到1939年秋，德国全部军费开支猛增到900亿马克，几乎占同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5，军火生产扩大了11.5倍，等于美英两国之和的一倍以上。民用消费工业发展极为缓慢和落后，只增加43%。美国多数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现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赞成用武力分割世界，而是主张实行经济兼并和和平分割的途径。同时，美国长期盛行孤立主义。因此，在罗斯福执政前后，美国军费开支很少，在世界上仅占第16位。

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是德美两国克服经济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德国主要是通过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和“普遍强制劳动服役法”，利用开辟战备工厂、设施，扩大就业人员，带有强制性性质。同时也通过发行劳动国库券，用于中央、州和地方修建高速公路、公用事业管道、高速公路、桥梁、运河、整治河流、建设住宅等^{④⑥}。这些工程有的也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然而更多的是从军事备战角度考虑的。至1936年德国虽然解决了600万人就业，实际上仍然存在一批失业大军，1937年仍有270万人失业。美国为解决失业问题，采取的途径与德国基本相同，也主要是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扩大就业人员，如修筑公路、建造学校、飞机场和公园等，解决了400万人就业。然而，这些工程的用途与德国不同，主要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从以上不难看出，德国和美国为克服危机，都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不同的是，德国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与德国法西斯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剥夺德国人民民主、自由的政策相反，罗斯福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对美国人民采取温和的收买政策。“新政”颁布了“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可以不受垄断资本家的约束，为自身利益开展工会活动，在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工人有同资方谈判的权力。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工会会员从2857000人增加到3728000人^{④⑦}。工会活动的广泛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还先后颁布了“存款保险法”、“紧急救济法”，还发放了“住宅贷款”和“失业救济金”，使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劳动人民经济处境稍为有所改善。

相对于希特勒法西斯专政，“新政”对资本主义生产某些环节进行了调整和改良，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成功的反危机措施。“新政”实施后，美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35年，美国国民总收入从1933年的近425亿美元增加到571亿美元，仅1936年5月到1937年9月，就业指数从96.4增加到112.2，工资总额指数由84增加到109，工业生产指数从101增加到117。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资本主义从肖条的逆境中摆脱出来，走上了起死回生的道路，挽救了垄断资本主义。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当这个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的制度临到毁灭的边沿的时候，是这个政府挽救了它。”^{④⑧}

正因为如此，美国法西斯在罗斯福实行新政期间，同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力量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又涌现出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如“美国自由同盟”、“社会正义同盟”、“德美同盟”、“白衣党”、“蓝衣社”、“十字军”和“分享财富会”等，至1939年底，法西斯组织共有250多个，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这些法西斯组织广泛建立暴力武装，进行阴谋活动，甚至企图推翻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建立法西斯专政。

三

为克服危机，德国和美国都是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干预方式是不同的，是属于两种类型：一种是德国式的，实行法西斯专政；一种是美国式的，实行“新政”。这两种方式都是两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全面干预国家经济生活，防止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的发生,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

就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而言,法西斯德国尤甚于美国。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剥削,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国家干预是在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极度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在德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正如科佩尔·S·平森所指出的:“民族社会主义是20世纪对理性的反叛的最极端的表现。它的基本心理特性是反理智主义的。它的整个意识形态结构不是以理性为基础,而是以诉诸情感和力量为基础。”^{④3}美国实行“新政”,虽然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加强了国家的职能,但实际上是在继承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和德国实行的法西斯专制是迥然不同的。

尽管在国家干预经济政策问题上两国是一致的,由于德国谋求对外扩张,走的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同途殊归,最后两国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在军事力量膨胀之后,希特勒迫不及待地发动欧洲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法西斯把大批德国人民驱赶到侵略战争的道路上充当炮灰,成千上万的人惨死在战场。侵略战争的结果是军费大量开支,德国经济弄得山穷水尽,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际上,法西斯德国陷于世界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包围之中,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在摆脱孤立主义之后,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由于“新政”的实施,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接近1929年的水平,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二战爆发后,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弹药库”,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如季米特洛夫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如果在美国得到胜利,那就是整个国际环境发生极重大的变化。”^{④4}

希特勒政权对德国和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个被垄断资产阶级寄予厚望的法西斯政权,并没有挽救和振兴德国资本主义,相反,把德国资本主义引上了绝路。法西斯德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中崩溃,希特勒畏罪自杀。战争结束后,德国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只是在同盟国的管制下,彻底铲除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实行民主化的改革措施,使有浓厚封建势力影响的德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东部德国在苏联帮助下,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德国在英美扶持下,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实行凯恩斯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制度的铲除和民主化措施的实施,为联邦德国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与德国相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美国霸主地位的取得,固然是由于利用战争大做军火生意,发了横财,然而,罗斯福新政也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斯大林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④5}当然,罗斯福毕竟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新政”也“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④6},它是“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④7}。然而,也不能不承认“新政”是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30年代经济危机使德国出现了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美国出现了罗斯福“新政”。法西斯独裁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德国资本主义引上绝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资本主义暂时渡过了危机,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30年代经济危机给德美两国带来的结果。

德美两国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为什么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导致不同的结局呢?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二战爆发是由30年代经济危机引起的,这种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30年代经济危机首先是从美国爆发的。如前所述,美国经济危机比德国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然而美国并没有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法西斯主义,30年代经济危机在某些国家导致法西斯的兴起,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30年代经济危机使德国法西斯夺取了政权,美国法西斯没有夺取政权,这就是两国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导致不同结局的主要原因。研究德国法西斯为什么在德国夺取政权,而美国法西斯没有夺取政权,相反在猖獗10年之后自行走向衰落,这是我们分析两国在经济危机中导致不同结局的原因之所在。也就是说,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在最发达的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英国、法国未能有所成就,相反,它正是在社会和国家里还存在强大的前工业因素的地方如意大利和德国却发展起来了。”^{④8}

四

法西斯主义是30年代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在有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在有的

国家又没有夺取政权？这是因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常常是由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法西斯能否夺取政权，除了30年代经济危机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外，还受各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及现状等因素所制约。也就是说，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是否发生有利于法西斯夺权的一系列变化的因素所决定。比如德国，由于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德国文化和传统的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使得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活中能被接受和传播开来。”^{④9}因而，纳粹主义“许多表现都曾引起人们对德国传统和德国文化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回忆”^{⑤0}。美国虽然也有与德国一样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没有同德国一样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法西斯没有在美国夺取政权。归纳起来，德美两国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德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也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基础差异比较大，从而使两国上层统治阶级在政治思想素质上差距比较大，在抵制前资本主义因素及抵御法西斯进攻的能力上存在差异。德国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不健全，封建势力影响比较深。资产阶级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是一个很脆弱的民主政权。当时有一种说法，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⑤1}，政府中“许多人本质上是君主主义者”^{⑤2}。同时，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影响较深，“在德国也缺乏一些有助于使一个民主政府顺利行使职权的社会民主”^{⑤3}。由于“民主得不到保障，帝国权力思想也未能消除”^{⑤4}，因而魏玛政府的民主根基是不牢固的，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法西斯势力乘机而起，大肆攻击共和国，从而加深了共和国民主制危机。而德国资产阶级又十分软弱，挂着民主共和头衔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是一些“没有信仰的陈腐的小资产阶级”^{⑤5}。他们在法西斯进攻面前逐渐抛弃了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最后不得不起用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纳粹运动得以发展和变得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玛共和国全部历史中民主政权及其领导人的软弱和懦弱。”^{⑤6}法西斯登上德国政治舞台，是具有封建保守性的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和法西斯进攻面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让步。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法西斯上台“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⑤7}

经济危机期间，“美国财政资本也充满了法西斯精神”^{⑤8}，也有不少人拥护法西斯，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⑤9}；“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⑥0}。甚至扬言把美国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浮华世界》周刊还呼吁：“任命一个独裁者吧！”^{⑥1}然而，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其上层统治阶级自华盛顿坚持反对在美国确立君主制、不当国王以来，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美国长期形成的民主自由原则成为美国人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⑥2}。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思想意识也比较浓厚。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居民大都是来自西欧饱受封建专制制度压迫的劳苦人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诚然，这些外来移民中也有少数人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比较大，“大批外来移民中的反动集团”为一些法西斯组织“提供了主要基础”^{⑥3}。但应该看到，参加法西斯组织的移民也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移民中的极右分子，如“德美同盟”主要是这两国的移民。从整个移民队伍来看，崇尚民主、自由的人占绝对多数。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构成美国人口的是一些早已从君主和地主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⑥4}，因此，美国民主传统的根基比较坚实。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封建制度的影响和阻力十分弱小，不象德国那样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从历史继承性关系来看，美国没有法西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恩格斯指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⑥5}，美国建立的是“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⑥6}。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前资本主义因素，在经过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后，这些因素也得到了清除。总之，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基础比德国雄厚。虽然法西斯在美国也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但他们未能颠覆民主政体，始终不过是一群偏激狂徒”^{⑥7}。林克和卡顿指出：“对于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这种失败，美国人民应当感谢他们的传统。”^{⑥8}

同时，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抵制，也是法西斯未能在美国夺取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斯福一直恪守美国的民主传统，并以杰斐逊、杰克逊等总统为代表的民主传统的继承人”自居^{⑥9}，因此自然反对法西斯。在他出任总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美国法西斯活动的高潮时期。罗斯福实行“新政”，对大垄断资本家和法西斯采取限制和压制的措施，推行有利于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政策，遭到一些垄断资本家和法西斯势力的反对，指责他把美国引向了社会主义。法西斯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头目库格林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叫嚷要“用枪弹”消灭罗斯福^{⑦0}。一些法西斯组织得到美国财团的支持，如汽车大王福特对

“黑色军团”提供不少资助，摩根、洛克菲勒等巨头对“美国自由同盟”给予不少津贴。在他们的支持下，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犹太人和反对罗斯福新政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运动。法西斯还企图策划暴动，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公开宣称“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①。然而，法西斯在美国嚣张一段时间后渐渐衰落下去了，这是罗斯福对法西斯抵制的结果。他在民主力量推动下，同法西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认为要制止法西斯势力，最主要的是首先扭转美国的经济形势。前已谈及，罗斯福在金融、工业、农业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形势不断好转，从而稳定和争取了民心，削弱了法西斯的活动市场。此外，罗斯福采取了坚决镇压法西斯的措施。1934年，他命令联邦调查局组织力量成立了“监视法西斯组织”，并逮捕了法西斯分子汤森和杰拉尔德·史密斯，把“德美同盟”头目库恩判刑。罗斯福坚决堵截法西斯分子混入政府部门工作。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有人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西斯分子朗格时，罗斯福果断地指出：“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并郑重说明：“不论是谁，不论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能在这里工作。”^②1937年，罗斯福连任总统后，下令取缔了不少法西斯团体和纳粹组织，有力地打击了法西斯势力，使法西斯活动逐渐在美国偃旗息鼓。

其次，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也比较大。经济实力的强弱，与法西斯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关系。美国的经济基础远远超过德国。美国在一战中发了横财，战后垄断资本大为膨胀，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绝对优势，成为20个国家的债权国，黄金储备在1924年占资本主义世界40%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而德国是一战中的战败国，经济完全崩溃。只是从1924年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依靠美国的贷款，才使德国经济得以恢复。然而，德国经济的繁荣是短暂的，只不过是蜃楼幻景，是建立在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上面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埃杰顿指出：“德国的某些工业集团完全是靠我们的金钱恢复起来的。”^③一旦美国停止贷款和援助，德国经济脆弱性的特点就明显暴露出来了。美国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拥有广大殖民地，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凡尔赛条约使德国殖民地被剥夺殆尽，市场狭窄，资源贫乏。美国还拥有自己的美元经济区，德国没有自己的马克集团。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克服危机的机制比德国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缓冲经济危机。比如，罗斯福上台后采取国家干预经济措施，拿出大量资金来资助大银行、大企业、大农场，使其免于破产，并为大批失业者提供救济金。虽然国家预算赤字因此不断上升，但由于以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从而缓解了危机，稳定了局势，不需要用法西斯专政的强制办法控制危机，也没有必要走上战争冒险道路去扩大市场，掠夺资源。德国不仅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并且是一个负债国，而且凡尔赛条约赔款尚未付清，无力拿出资金扶助濒于破产的企业和金融系统，只有依靠法西斯的专制主义措施来克服危机。由于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现状极为不满，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也急于要把希特勒扶上台，支持法西斯发动战争，认为只有剑才是德国经济政策。美国是一战后既得利益者，希望巩固已取得的势力范围，维护现有的经济秩序，因此不主张扶持法西斯上台，走军事冒险道路。

再次，德国和美国在民族心理上的差别也比较大。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人民群众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有助于法西斯的兴起。德国是一个有着浓厚民族意识的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烈。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然而也有其现实原因。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奴役和压迫，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而在德国滋长了对战胜国的民族仇视心理，加上德国又是一个有着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些客观条件为德国法西斯的产生和上台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这些因素，希特勒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民族社会主义则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以牺牲个人作为代价”^④。这样，他就把纳粹党吹嘘为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并且利用德国人民民族情绪，进行民族复仇主义的宣传，极力鼓吹德国人民的贫困是凡尔赛条约造成的，要使德意志民族振兴，就要废除凡尔赛条约，推翻魏玛共和国，从而争取了不少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人民的支持。在法西斯煽动下，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到了疯狂的程度。希特勒上台后极力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是势所必然的。而美国人民大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远离欧洲来到北美定居，民族观念十分淡薄，因为这些移民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1880年主要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此后大批来自中欧、东欧和北欧，如奥匈帝国、俄国、挪威、瑞典等国，民族成份十分复杂。北美的印第安人又逐渐被外来移民取而代之。所以，美国人民没有象德国那样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相反，“30年代中美国人民占支配地位的情绪，比起以前来，是一种甚至更为顽固的孤立主义情绪”，要求政府“不参与欧洲纠纷”^⑤。这也是美国没有被法西斯征服、没有走上战争道路的又一原因。

第四,两国无产阶级力量在抵御法西斯进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经济危机使两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由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下,德国共产党犯了左倾错误,没有根据德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制定一条正确路线和政策,相反却提出超越客观实际和人民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样就把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推到纳粹党一边。同时,德国共产党把纳粹运动从本质上看成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运动”,认为在工人运动发达的国家里,法西斯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在建立反法西斯阵线问题上,固然社会民主党右翼多次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建议,但共产党也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对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没有进行争取工作,两党互相斗争,“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比纳粹更凶恶的敌人”。德国共产党“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开路先锋来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以露骨的反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①6}。因而德国无产阶级力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德国形成了法西斯力量不断膨胀,无产阶级力量虽然也在发展,但远没有纳粹势力迅速的局面。无产阶级力量在德国最终没有能阻止法西斯上台。在法西斯上台后,德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由于希特勒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大肆镇压共产党,使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没有力量推翻法西斯的统治。美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也犯了一些“左”的错误,包括后来对罗斯福和“新政”的看法。然而,美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力量比较集中,把许多松懈的全国性工人团体组成为全国产业同盟,不象德国那样四分五裂。而且,美国法西斯组织比较分散,力量不是很强大,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力量大于法西斯力量的局面。在罗斯福上台前,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法西斯是不敢问鼎美国统治大权的。罗斯福执政至1939年,法西斯在美国发展较快。然而,罗斯福不象德国法西斯那样大肆镇压共产党和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是通过“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可以不受垄断资本家的约束,为自身利益开展工会活动。美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条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如青年、妇女和黑人)反对国内外法西斯。当法西斯势力企图推举兰登为1936年大选的候选人、阻止罗斯福连任时,美国共产党“决定集中主要火力反对兰登”,从而“在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罗斯福”^{①7}。在美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支持下,罗斯福再度当选,从而使法西斯右翼集团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攫取政权的计划破产。美国共产党“在遏制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①8}。

第五,两国法西斯力量也有明显差异。德国法西斯力量主要集中于纳粹党,而且有非常明确的纲领和斗争目标,针对现实问题,在宣传和欺骗群众方面有明确的主张和口号,斗争策略也比较灵活,因而对群众的欺骗煽动性大。德国法西斯发展快还与大部分垄断资本家及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支持有关。不少垄断资本家给纳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有的在政治上为希特勒穿针引线,扩大纳粹党的影响。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就是通过“传统的上层各集团和纳粹运动的领导层之间的一种‘联盟’”“这条弯路”实现的^{①9}。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前的1月26日,容克垄断资本家代表巴本与总统兴登堡、泽尔德特(工厂主、政治家、钢盔团领袖)和迪斯特贝格(钢盔团领袖)会谈时再次试探性说明成立“以希特勒为总理领导下的新政府的绝对必要性”^{②0}。美国法西斯组织虽然比较多,但各自孤立,力量分散,而且“派系活动和互相争权夺利”,使法西斯“小首领无法团结”^{②1}。美国法西斯没有一个象德国纳粹党那样的全国统一性组织和领导中心,自然也没有一个统一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美国只有少数垄断资本家(如摩根、杜邦、梅隆等)资助过有关法西斯组织,大多数垄断资本家没有支持法西斯。这些因素也是美国法西斯没有成就大气候的又一原因。

综上所述,30年代经济危机在德美两国发生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很值得研究。这些变化是30年代经济危机引起资本主义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研究30年代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危机对各国产生的危害,以及各国在对付危机采取的政策措施本身,而且也应该看到这些政策措施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和影响。在危机中建立的德国法西斯政权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使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德国等国家的法西斯在危机中夺取政权后,迫不及待地走上了战争冒险道路。世界人民对危机中滋生的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影响在二战后削弱了,没有任何市场。同时,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随之蓬勃兴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一些封建余毒比较浓厚的国家得到发展,使这些国家在战胜封建势力影响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危机中出现的罗斯福“新政”率先把美国引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从此以后,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和调节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项经常性的职能”^{②2}。资本主义各国

大多仿效罗斯福“新政”，到5、60年代，国家干预经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一个完整的生产关系，如制定全国经济计划或主要产品生产计划，采取一系列财政、信贷措施等，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后有了相当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在经过30年代这场“大病”之后，又走上起死回生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②⑬④⑨⑤⑥⑥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版，第598、601、554、652、671、670、554、665页。

③⑫⑬⑯⑳㉑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歇尔：《魏玛共和国的瓦解》(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杜塞尔多夫1978年版，第204、534、535、56、172、625页。

④⑩⑲⑳㉑㉒㉓ 迪特利·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255、257、274、277、275、264、270页。

⑤⑥ 卡尔莱兹·P·金德莱贝格尔：《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Charles P. Kindleberger, Die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9—1939)，慕尼黑1979年版，第179、198页。

⑦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译版，第26、79、106、80、80—81、81、157、238、162页。

⑧⑫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8、565页。

⑨⑬⑰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和党史》，世界知识出版1957年中译版，第176、316、361页。

⑪⑮⑳㉑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1933—1939年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Karl Dietrich Erdmann, Deutschland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39)，慕尼黑德语袖珍本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43、131、68页。

⑭⑯⑳ 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第315、608、609页。

⑰⑱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107—108、108页。

⑲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

⑲ 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对弱小手工业等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和保护政策，维护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⑳⑳㉑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Heinz Höhne,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汉堡1983年版，第103、17、269页。

㉑ 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版，第76页。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版中册，第30、30、31、92、39—40、59、55、111、137、113、111页。

㉜ 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版，第176页。

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8页。

㉞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第三帝国》(Klaus Hildebrand, Das Dritte Reich)，慕尼黑奥尔登堡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5页。

㉟㊱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2页。

㊲㊳㊴㊵ 《斯大林文选》，第3、2、2、498页。

㊶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魏玛共和国》(Karl Dietrich Erdmann, Die Weimarer Republik)，慕尼黑1981年版，第244—245页。

㊷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0页。

㊸㊹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3页。

㊺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55页。

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48—349页。

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81页。

㊽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341页。

㊾ 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三联书店1979年中译版第3卷，第687页。

㊿ 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